

陽光總會再升起

◆ 撰文 / 何日生

死亡的感受是什麼？詩人徐志摩曾經用一首詩來描述：

當我死的時候，
親愛的，別為我唱悲傷的歌，
我的墳上不必安插薔薇，
也無須濃蔭的柏樹，
讓蓋著我的青青的草，
淋著雨，也露著露水。
假如你願意，請記著我，
要是你甘心忘了我。
我再見不到地上的青蔭，
覺不到雨露的甜蜜；
我再聽不見夜鶯的歌喉，
在黑夜裡傾吐悲啼。
在悠久的昏暮中迷惘，
陽光不升起，也不消翳。
我也許，我也許記得你；
我也許，我也許忘記。

這優美柔順的詩句底下，蘊含著的，是對於死亡的孤寂與傷感。徐志摩當然是活著地描述死亡的感受。但是沒有人有真正死亡的經驗，因此所有對於死亡的描述，不過是一種臆測、揣想與解讀。不同的人對於死亡的臆測與想像不同，詮釋與解讀的方式也就大不相同。

不只死亡的詮釋因人而異，即便同一個人因為心境與情境不同，對於死亡都會有不同之感受與揣想。徐志摩在另外

一篇散文裡同樣以死亡為題，描述一位小女孩，她的媽媽去世了，可小女孩不覺得。她每天都到媽媽墳前做玩具，寫信給媽媽，在媽媽的墳上種花，和媽媽有說不完的話。旁邊的大人看了心酸，可小女孩卻是很快樂。

小女孩的心境裡，媽媽還在。死亡究竟是什麼？每一個人的詮釋不同，感受也完全不一樣。因此沒有存在一種所謂「真正而確切的死亡感受」，它是被不同的人不同之心境與情境所決定的。它的面貌、感受與意義可以是多樣的、複雜的、可變異的、可被引導的。無怪乎英國著名哲學家培根會說：「死亡的儀式比死亡的本身更可怕。」這如同德希達(Jaques Derrida)的延異理論(différance)所言，意義或感受是放在一個時間與空間的網絡中被實踐。看似同一件事，但是放諸不同之時間、空間與人與人的對應關係底下，會創造不同的意義與價值模式。

慈濟大體捐贈提供人們對於死亡的一個全新的意義模式，證嚴上人讓人們對於死亡的印象從陰森、腐朽、寂滅、被遺忘的感受，轉化為在「空間上」是晶瑩剔透的潔淨莊嚴、在「價值上」是神聖化的利他之表現；在「時間展延上」，是在救助他人中延長自我生命之價值。

證嚴上人創立的大體捐贈，也改變了醫學生對於身體的感受，從面對一具腐朽的無名屍，在解剖時用戲謔來逃避逼視死亡的恐懼以及對惡臭屍體的厭惡感，轉化為恭敬審慎地面對一位大捨的親人，激發感恩與疼愛。醫學生對身體的感受是恭敬的、疼惜的、可親近的、甚至敬佩的。這種對身體的正向感受如同耶魯大學努南教授所言，將伴隨他們的行醫生涯，決定性地影響醫生們用敬意及正向情感對待一個生病的身體。

一位芬蘭醫學會的會長在拜訪了慈濟大體解剖室之後，很有感觸地說，她覺得很不可思議，慈濟的解剖教育能做到讓學生真正地面對一位他們認識且了解其生平的大體。這麼嚴肅恭敬地面對一個往生者的身體進行醫學人體教育。她知道西方的醫學生在解剖中會拿器官開玩笑，說這是你的肝，這是你的心臟，將器官扔擲過來，丟過去給彼此。西方科學主義精神將大體過度物化的結果，讓學生避開情感投入，表面看起來是避免心靈受傷，實則讓學生對人體的感覺整個抽離。客觀化了的人體，將對他的行醫生涯產生重大影響。

慈濟要求學生對大體捐贈者投入個人情感，去體會這躺在面前的大體，曾是一個活生生的生命，並且是一個高貴充滿愛的靈魂。這一方面避免將身體物化，也同時深化學生對生命的尊重。楊雅雯醫師就回憶當年在慈大解剖大體老師的心情。她說：「當我打開他的身體之後，其實我跟學長發現她腸子的地方

有一些異常的沾黏，也有幾個地方有幾個硬塊。我們那時候才知道說那是因為肺癌多處轉移然後往生的，我感到非常的心疼。甚至會想說我今天做哪個地方是不是太粗魯了，雖然我知道她已經沒有感覺了，但是我還是會很怕去弄痛她，或是做錯什麼事情。……」

一九九八年一位大體老師李鶴振，他拒絕做化療以便能捐大體。他往生前和學生見面談話，他說：「疼痛往往在半夜來臨，人在受苦的時候，意志力也會被擊垮。有時也很想跟它拚一下，接受開刀或接受化學治療，看看會不會舒服一點？反正能活多久算多久。但是我的病，動刀或做化學治療都是多餘的，我只希望把身體完完整整交到你們手上，給你們做研究，或許對人類會有幫助，如此一點心意而已。……」當學生們解剖李鶴振老師的遺體，他們的內心想起他曾說的話語，怎能不感動？怎麼能不戰戰兢兢、崇敬謹慎地解剖他的遺體？

許多大體老師一生奉獻慈濟，當學生認識到在他眼前所躺著的是曾經傑出奉獻心力給社會，利益眾生的人，在他們死後又願意將大體留給醫學生實驗學習。這種以身示現的典範，讓學生學習的不只是專業的醫學知識，而是成爲一個懂得利他，品行更爲健全的人格。這是全人教育的典型。他們被期待真正要學習的就是大體老師無私奉獻的大捨之心。


